

導言：約會軟件亦有政治

兩個月前，我兩個女生朋友都在刷手機、發照片。我就覺得挺有意思的，因為就像QQ和微信〔這類軟件〕啊，很多頭像都不是個人的〔照片〕。沒有真實的頭像，我可能就沒有甚麼興趣。因為對方長甚麼樣啊、多大年紀啊，你都不知道。但這軟件上面會有些照片，就會覺得很真實的，上面會有一些興趣愛好甚麼的。然後我朋友她們也在發，她們告訴我，她們有個朋友〔找到戀愛對象，都〕是通過這個軟件的。然後我想，發照片也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下載了。

Nancy如此回憶起她最初在手機上下載探探的原因，這是一款在中國盛行的約會軟件。¹2016年10月，當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手機

1 Nancy是受訪者自己選擇的化名。我鼓勵所有受訪者起一個中文或英文化名。如果他們沒有想法，或者提出的化名與真名過於相似，我就會為他們起一個。

約會軟件早已風靡全球。在英語國家，Tinder和Grindr這兩款約會軟件分別深受異性戀用戶和男性酷兒²群體的歡迎。不過，與其他網絡服務一樣，中國也有自己的約會軟件生態。創立於2011年的陌陌目前是中國異性戀用戶使用最廣泛的一款約會軟件。截至2017年底，它的月活躍用戶已接近一億（北京陌陌科技有限公司，2019）。據報導，探探於2014年推出，但在年初已擁有超過兩千萬的月活躍用戶（“A Guy Who Grew Up in Stockholm’s Suburbs,” 2018）。³對於男性酷兒群體而言，Blued和翻咔（前身為Aloha）是市場龍頭，而熱拉、LESDO和LesPark（拉拉公園）則在中國的女性酷兒群體中廣受歡迎。

本書認為，這些軟件以其獨特的市場定位、色彩基調和介面設計，並不僅僅是在手機上運行的軟件，而是一道道門戶，將人們從庸常的物理環境帶入一個激動人心的虛擬世界，其中充滿了關係的可能性。同時，約會軟件也是權力動態的場域，深受中國社會異性戀本位（heteronormativity）和父權制的影響。

隨著各家公司不斷擴展並豐富其軟件功能，中國的約會軟件已難以被簡單歸類為同一類型。然而，這些軟件大多擁有五個共同的主要特徵，這些特徵具備特定的直觀功能（affordances），構成了後文將深入探討的「網絡化性公眾」（networked sexual publics）。第一個常見特徵是「附近的人」功能，這類似於經典的Grindr介面。軟件會根據地理位置，按照距離由近及遠推薦一批用戶簡介，任何用戶都可以向附近的人發送訊息。第二項功能是Tinder首創的「滑動」配對功

2 酷兒（queer）是當代學者和社會運動人士對非異性戀者和非順性別者的統稱。這個詞彙原本帶有貶義，但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被同志社群重新挪用，轉化為抵抗主流規範的話語。

3 2018年2月23日，陌陌宣佈以約六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探探。

能。用戶會看到一系列推薦對象的照片，每次一張。如果用戶對屏幕上的照片感興趣，可以右滑照片表達好感。只有當雙方互有好感時，用戶才能開始聊天。在西方的軟件中，「附近」功能和「滑動」功能通常只會二選一；但中國的部分軟件兼具這兩種功能。第三，用戶可以使用「附近的群組」功能創建各類主題的群組。這種群組與網絡論壇相仿，唯一不同的是群組的成員就在附近。第四項功能類似於Facebook（臉書）的「狀態更新」，向網絡聯繫人或附近的人分享訊息或圖片。最後，大多數中國約會軟件都提供「直播」功能。用戶可以註冊成為主播，向任何人直播影片內容。⁴這一功能是陌陌和Blued等軟件的利潤中心（Deng, 2018; Edmunds, 2017; S. Wang, 2019a, 2019b）。觀眾可以從軟件中購買虛擬禮物，送給自己喜歡的主播。軟件會從禮物的貨幣價值中抽成，剩餘部分則歸主播所有。⁵

Nancy目前單身，年近三十，之前只談過兩次戀愛，非常渴望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她說：

微信的話，它有「附近的人」嘛，可以認識新朋友。但上面很多都看不到本人的照片……像如果交友的話，我可能更傾向於探探吧。雖然說它很多人都不是為了交友，就是為了「那個」，但就是說，放自己照片上去好像可以積攢幾個讚。（研究員：你上面匹配的對象多不多？）差不多上百個。

與Nancy一樣使用這些軟件的數百萬中國用戶對它們有特定的稱呼。在中國，這些軟件被稱為「交友程式」或「交友軟件」。「約會軟件」一詞並不常用。對於熟悉中國交友軟件文化的讀者而言，「約

4 一些軟件，例如Blued，會要求用戶在成為主播前先上傳身分證。

5 這類軟件常常更新功能。本書中的描述僅適用於撰文當時。

炮神器」一詞想必最為熟悉。「約炮」是「勾搭」的新說法，其中「炮」字暗示「陽具」。在陌陌和Blued等軟件上，有意勾搭的用戶可能只發一個字：「約？」。⁶「神器」代表「強大的工具」或「神奇的工具」。因此，「約炮神器」的意思就是「神通廣大的勾搭工具」。這個詞的起源已無從考證，但在2012年，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美國演員隋凱（Michael Stephen Kai Sui）製作了一條風靡網絡的影片，其中提到了「約炮神器」，這個說法從此流行開來。⁷

這個領域最早的一些研究人員將這類應用軟件稱為「社交軟件」、「勾搭軟件」、「定位感知的約會軟件」或「地理社交網絡軟件」（例如，Albury & Byron, 2016；Blackwell et al., 2015；T. Liu, 2016；Rice et al., 2012）。為簡單起見，在本書中我將使用「約會軟件」來指代這一類型的通訊技術。然而，正如後文所述，這些軟件的營銷定位並不只是一個約會軟件，用戶也不只是用它們來尋找戀愛對象。有鑒於此，儘管我用「約會軟件」來表示這種共同的手機軟件類型，但本書的視角更為廣闊，關注用戶在交友、約會之外對這些軟件的解讀與使用。

回到我與Nancy的對話，她無意在探探上約炮。實際上，她認為這個軟件不僅能保護她免受不請自來的性要求，還可以讓她看看帥哥。她說：

6 「約？」可以對應西方約會軟件文化中的「You up?」。二者的區別在於，人們往往在深夜才傳「You up?」，「約？」則沒有時間限制。

7 隋凱在微博上分享了這段影片，其中他模仿了12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男士在用中文聊天。在對話中，他提到了「約炮神器」。截至本文撰寫時，讀者可在以下網址觀看完整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dApqW8WZk&list=RDD9dApqW8WZk&start_radio=1&t=0，或在YouTube上搜索「隋凱模仿分飾12人」。

〔探探〕上面……設計了一些關鍵詞啊，比如說約炮甚麼的，系統會提醒你可以舉報〔騷擾〕。就是，我覺得這個軟件設計的初衷還是好的吧，不是說要搞成那些亂七八糟的，還是有規範的……我這個人是比較看臉的，因為如果你不了解別人內心，肯定是從人家外表開始，外表有興趣，才會希望深入地了解……我女生朋友看照片的時候就會說，「這個好帥，這個好帥。」我就覺得，「哇！真的，這上面的顏值真的普遍偏高。」

根據Nancy對探探的描述，這款軟件允許用戶舉報性騷擾，增強了她的信心。從Nancy的角度來看，探探顛覆了以男性為主體、女性為客體的傳統男凝模式(Mulvey, 1975)。她可以觀察、了解更多的潛在伴侶，而不必一直承受性要求的負擔。

2018年9月，我和Nancy再次見面聊聊天。從第一次見面到現在，我和她在微信上斷斷續續交流了兩年左右，我決定向她公開我的性向。我隨口提到了和男友的計劃。一聽到我有男友，她咽下食物，看著我的眼睛說：「我想我也喜歡女人。」她的出櫃讓我很驚訝，因為2016年在我們的初次訪談中，她認為自己是異性戀。此外，在第一次訪談之後，她告訴我她曾和一個在探探上認識的男人約會過，有時她還會問我在美國約會和在中國有甚麼不同。我沒想到她會向我坦承自己是個酷兒。她說她最近開始懷疑自己的性向，因為她已經有整整一年沒對男人感興趣了。她還說，因為她老家的LGBTQ（性少數）⁸文化非常顯著，所以她並不介意自己可能是雙性戀。隨後，我們聊到了中國女性酷兒常用的軟件，我鼓勵她嘗試一些，探索自己的性向。

8 LGBTQ即女同志(lebian)、男同志(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酷兒(queer)的總稱。

Nancy的經歷是本書記錄分析的眾多故事之一。約會軟件是人際關係的新平台，這種新興技術如何塑造、重構人際關係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不過，本書將從批判的角度出發，聚焦約會軟件給用戶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拓展我們的理解。對於像Nancy這樣逐漸意識到自己是雙性戀的用戶而言，「約會軟件」意味著甚麼？無論用戶是異性戀還是酷兒、女性還是男性，這些軟件如何把這些用戶聚合成新型的公眾（publics）？

在本導言中，我將為全書奠定認識論、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首先，我認為有必要從批判的角度審視約會軟件。為證明這一觀點，我將介紹三組相互關聯的文獻，它們為我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參考的框架。我還將簡要介紹我的研究過程，尤其突出在研究與性相關等敏感話題時的一些關鍵倫理問題（詳細的反思請見附錄）。最後，我將概述本書的各個章節，闡明批判性的視角如何幫助我們在中國異性戀與酷兒群體的背景理解約會軟件。

約會軟件研究的兩種傳統

自2010年代初以來，關於約會軟件的研究紛紛湧現。研究者借鑒社會科學傳統的理論和方法，探討了與人際交往過程相關的各類課題，如動機、功用、自我展示、關係發展與風險等等。⁹ 這些研究

9 以下是各類課題的一些研究：（1）人們為何使用約會軟件、他們具有哪些人口學特徵和心理特徵（例如，L. S. Chan, 2017a, 2017b, 2019；Sumter & Vandenbosch, 2019；Timmermans & De Caluwé, 2017b）；（2）人們使用約會軟件的目的，以及影響其各種用法的因素（例如，Miller, 2015b；Solis

方向至關重要。人們的確在發展人際關係，無論是戀愛關係或肉體關係、長期或短期、認真或隨意。在我早前的研究中，我將由約會軟件促成的親密關係形式稱為「網絡化的親密關係」(networked intimacy; L. S. Chan, 2018)。這個概念類似於「移動的親密關係」(mobile intimacy; Hjorth & Arnold, 2013)、「中介的親密關係」(mediated intimacy; Attwood et al., 2017)以及「虛擬的親密關係」(virtual intimacy; McGlotten, 2013)，但我更加強調約會軟件所帶來的廣泛連通性的網絡化屬性。¹⁰ 如前所述，網絡化的親密關係具有內在的矛盾性，人們在約會軟件的自我介紹中所表述的關係目標，並不一定符合他們的實際需求或最終所得；精心撰寫的自我介紹必不可少，但不一定會被認真對待；與大量潛在伴侶的廣泛連通性可

& Wong, 2019; Sumter et al., 2017; Timmermans & De Caluwé, 2017a; Van De Wiele & Tong, 2014); (3) 人們如何在約會軟件上表現自己，以及自我表達與面對面交談的影響 (例如, Birnholtz et al., 2014; Blackwell et al., 2015; L. S. Chan, 2016; Duguay, 2017; Fitzpatrick et al., 2015; Miller, 2015a); (4) 人們如何在約會軟件上發展關係 (例如, L. S. Chan, 2018; De Seta & Zhang, 2015; Fitzpatrick & Birnholtz, 2018; Hobbs et al., 2017; LeFebvre, 2018; Licoppe et al., 2016; Timmermans & Courtois, 2018; Tong et al., 2016; Yeo & Fung, 2018; Y. Zhang & Erni, 2018); (5) 使用約會軟件的風險與疑慮 (例如, Choi et al., 2017; Corriero & Tong, 2016; Landovitz et al., 2013; Lutz & Ranzini, 2017; Rice et al., 2012; Sawyer et al., 2018; Yeo & Ng, 2016)。

- 10 許多學科都曾探討過親密關係。我對親密關係的理解主要基於社會學文獻，例如，吉登斯(Giddens, 1992)的《親密關係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慾》(*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以及鮑曼(Bauman, 2003)的《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Liquid Love: On the Fragility of Human Bonds*)。

能有利也有弊。個人日常使用的約會軟件無疑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然而，從那時起，我日益關注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下，約會軟件與權力之間的關係。正如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警示，「個人即政治」。¹¹換言之，在人際關係的背後始終存在一個政治維度，個人問題永遠無法隔絕於強大的社會力量，反之亦然。¹²所謂「政治」，我指的並非狹義的選舉政治或公民參與，而是社會中對權力的不斷爭奪、分配與維繫。因此，政治是一種權力關係。正如米利特 (Millett, 1978) 在其開創性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中的做法，我也採用了這種更加廣泛的政治概念，以「性別與酷兒政治」(gender and queer politics) 來表示父權制下互相牽纏的傳統性別角色與異性戀本位，如何導致女性和酷兒群體在社會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這一批判傳統正是本書的基礎。

這種權力觀與福柯 (Foucault, 1978) 的觀點一致，即「權力關係並不外在於其他形式的關係(經濟過程、知識關係、性關係)，而是內在於其中」(p. 94)。借鑒福柯的觀點，我主張親密關係正是權力鬥爭的場所。因此在本書中，我不僅將約會軟件看作一種技術產

11 「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這句話常被認為是出自美國女性主義者卡蘿·哈尼施 (Carol Hanisch)。但哈尼施 (Hanisch, 2006) 解釋道，這個詞其實是由《次年筆記：婦女解放》(*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 Women's Liberation*; 1970) 的編輯舒拉米斯·費爾斯通 (Shulamith Firestone) 和安妮·科德特 (Anne Koedt) 創造的，這份刊物當時刊登了哈尼施呼籲增強性別意識的文章。

12 我受到「維根斯坦訣竅」(“Wittgenstein trick”; Becker, 1998, p. 139) 的啟發：如果從約會軟件中剔除人際關係，還會剩下甚麼？

品，更視之為揭示權力關係的透鏡。如溫納 (Winner, 1980) 所述，技術產品具有政治性。有的技術在我們的世界中構建出利此損彼的秩序，有的技術則需要特定的社會條件才能正常運行。無論是創造新的社會關係，還是復刻現有的文化傳統，技術都在社會中發揮著政治的作用。

本書將進一步延伸「技術具有政治性」的觀點，以幫助我們理解約會軟件的政治性。約會軟件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秩序，其中某類性別與性向的用戶受到優待，而其他用戶則遭到歧視。這一秩序或許符合現存的利此損彼的社會秩序，也可能創造出一種新秩序以抵抗現有秩序。據此，我將借威爾遜 (Wilson, 2016) 之語，將約會軟件視為一種「親密關係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 of intimacy)；在威爾遜看來，「基礎建設提供了一種有用的類別，可以闡明親密關係如何與權力的實體化相互塑造」(p. 263)。例如，她認為公廁的設計以性別隔離為前提，而電話等電信技術則打破了空間上的劃分。通過將約會軟件視為一種基礎建設，我將關注點從純粹的個人關係——即社會科學對約會軟件的典型視角——轉移到親密關係中權力的談判、對立與顛覆。

網絡化性公眾

為刻劃新興的約會軟件文化的政治維度，我在此提出一個新概念——「網絡化性公眾」。「公眾」始終是一個寬泛而籠統的概念。利文斯通 (Livingstone, 2005) 將「公眾」定義為「對世界擁有共同的理解、具有共同的身分認同、主張包容、就集體利益達成共識」的人群集合